

■ 非官方报告

■ 绿色世界

# 中资银行：谁比谁更绿

## 民间报告首度披露 14 家中资上市银行绿色信贷现状

□ 本报记者 冯洁 发自北京

### 隐身大鳄的绿色标签

当厦门市民“散步”抗议危险化学品原料 PX 落户自家门口时，他们并不知道，为千夫所指的合资鹭翔集团提供融资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声誉清白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

当金沙江鲁地拉、龙开口两个水电站项目因“未批先建”被环保部叫停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违规撞线事件背后，至少有 8 家趋之若鹜的中资银行的身影——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以及光大银行。

大唐电力、亚洲纸浆 (APP)、中石油、紫金矿业、五矿集团……如果足够耐心和执著，留心散见于报章、国际组织的报告甚至工程进展通告里的只言片语，就能简单还原出高贵的银行与污染项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张你所不知的“黑名单”。

云南绿色流域的创办人于晓刚和国内 9 家环境 NGO 正努力发现这样一份“黑名单”——《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 (NGO 版)》(下称《报告》)。这份民间报告详细说明了 14 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履行现状。

绿色信贷主要指银行在信贷方面控制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和支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贷款。这份长达 12 万多字的民间报告比照国际通行的“赤道原则”，列举了评价银行“绿不绿”的八项指标。八项指标中，银行具体环境政策标准措施、执行绿色信贷的力度、是否有针对绿色信贷的专门机构和信息披露等四项，被视作是刚性的核心指标。

赤道原则是八年前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它主要用于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

2007 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信贷风险的通知》，这被认为是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肇始，而一位业内人士则称此举是“环保部门借了金融部门的一杆枪打污染”。

咨询机构商道纵横的郭沛源认为，2007 年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更多着眼于“控制”角度，即银行在放贷时要纳入环境风险评估，用金融手段卡住污染企业的脖子，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在落实过程中，“银行表现得挺灵活”。

银行 LOGO	上市银行名称	银行的环境政策标准和措施
	中国工商银行	对“两高”行业制定了行业信贷政策，形成全行绿色信贷建设的战略目标、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实施步骤。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信贷综合管理系统(CM2002)
	中国建设银行	没有阐述该行绿色信贷发展规划和目标。制定“两高”行业授信操作细则、不同行业准入标准和审批指引；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建设银行节能减排授信管理工作的方案》
	华夏银行	未对绿色信贷的发展目标提出可操作性的规划和设计。
	兴业银行	制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建立主要行业信用业务准入细则及信用审批制度。2008 年 10 月加入赤道原则，与商业银行国际准则接轨。
	招商银行	发布了《招商银行绿色金融营销指导意见》、《2008 年度信贷政策》，声称已制定的政策都适用于海外业务。2007 年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交通银行	制定了《交通银行“绿色信贷”工程实施暂行办法》，发布了关于切实规范环保标识分类提高“绿色信贷”工程质量的通知。是国内第一家对全部信贷客户和业务实行环保分类管理的商业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制定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贷投向政策指引(2008 年度)》、《关于开展能源效率融资项目的营销指导意见》、《绿色信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深圳发展银行	没有出台绿色信贷相关政策、措施或环境风险管理政策。
	中国民生银行	发布了《关于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完善相关行业领域信贷政策的通知》以及《关于贯彻落实银监会<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但没有自己的环境政策出台。
	北京银行	出台了《北京银行社会与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北京银行信贷项目建设用地管理规定》
	宁波银行	没有出台相关环境政策和实施办法。

本表格资料来源于绿色流域编著、即将出版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09)》

李伯根 / 制表

这种灵活反映为，在具体的绿色信贷政策上，14 家中资上市银行中，有的银行比照“赤道原则”，宣布了自己未来三年绿色信贷建设的目标、思路、框架和实施步骤，却因为缺乏细节佐证而显得语焉不详。

《报告》发现，很多中资银行，比如中国银行，依据 2008 年的公开信息，当时尚无具体的政策或方案出台，关于国家环保政策的落实情况如何也未明确提及，明显缺乏说服力。

另一个体现“灵活性”来自银行退出高污染高耗能、投资节能环保产业的数字，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退出贷款的数额以及投资环保项目的增长比例。在不知道基数是多少的情况下，即便账面业绩表现优良，也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真实含义，“假设一家银行此前环保贷款的比例只有 0.01%，只要提高到 0.1%，从数字上看就是增长了 10 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增长更像表面数字。”郭沛源的感觉是，银行更喜欢张扬后者，对于前者则遮遮掩掩，主要因为银行在操作层面上还没到位。

更有趣的是，在核心指标上表现参差不齐的 14 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在宣传范畴的外围指标上，却表现出了一致的不遗余力。

从推行低碳银行卡、号召电子账单到热衷于参评各类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奖项，《报告》显示，几乎每个银行都得到过各类奖项，而其中

### 如何让中资银行更好控制环境负面影响的贷款，如何更多地披露相关信息，成为中国绿色信贷的核心内容。目前，这一切在中国银行业刚刚起步

最为突出的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加入了“赤道原则”的银行，更是荣誉加身。

### 民间组织 VS 绿色信贷

和《报告》执行方的身份——民间组织一样，国际通行的赤道原则也是在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得以建立。本世纪最初几年里，花旗银行在几个项目贷款中成为众矢之的。秘密 Camisea 燃气工程、美国加州水源林红木砍伐项目、厄瓜多尔管道路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油田等项目，由于忽视环境责任和当地社区

利益，招致了环保 NGO 的猛烈抨击。国际热带雨林网络(RAN)发起了一场由众多知名人士参与的抗议活动，大学生客户甚至对着电视机镜头损毁花旗信用卡，这让向来衣冠楚楚的银行丢尽了脸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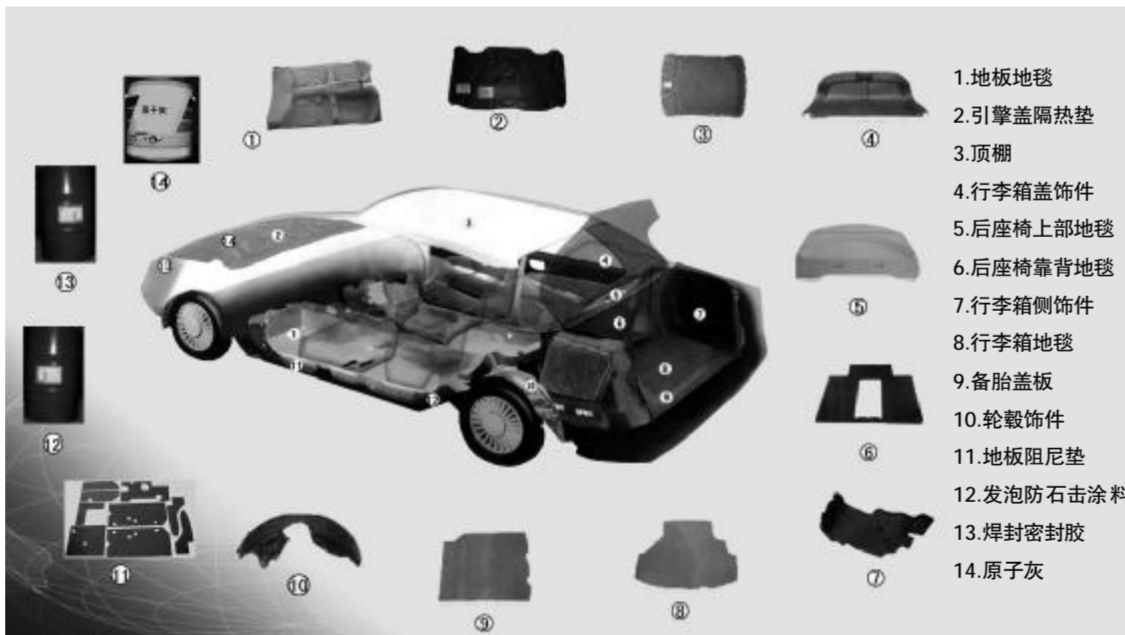
来自社会的压力旋即转化为银行的贷款风险。为此，花旗银行采取了全面的环保政策，制定了新的投资标准。2003 年花旗银行加入象征国际银行业环境准则的“赤道原则”。到了 2005 年，花旗银行在 21 个潜在显著环境风险的项目中只批准了 3 个，并按照赤道原则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严格执行。

回顾中国环境违规项目，之所以背后的银行毫发无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信息保密制度和公民社会力量的薄弱。

《报告》主要执行者于晓刚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撰写过程中，深感信息披露之难。尽管中国已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然而“要想跟踪资金在污染项目中的流转，查到银行在污染项目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很难”。

于晓刚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关闭淮河流域“十五小”企业的“零点行动”中，中国农业银行十几个亿贷款无法回收。安徽淮北市造纸厂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倒闭，淮北金融机构为此损失近 35 亿贷款。然而，这样的案例毕竟太少。

# 汽车之毒



14 种汽车车内空气污染源

迟迟未能出台。直到 2008 年初，中国首次制定的检测车内空气污染标准——《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得以出台，遗憾的是，《方法》并未包含如何判定车内空气质量超标等问题，使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中仍无据可依。

参与制定上述《办法》的环保部机动车污染控制专家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葛蕴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没有国外车内空气质量参照标准，也有很大的技术操作难度，但主管部门始终没有放弃，标准制定组也一直在努力摸索。

而现实中，汽车厂商似乎自有分寸。嘉诚实业一位技术人员受访时说，他们生产的阻尼板等配套产品，主要针对产品在 80℃ 条件下的气味进行评估。“目前，我们产品属于 2 级，

即可察觉但不令人厌恶，也就是无干扰性。”张瑛也表示，他们的产品有企业标准，肯定没有质量问题。

就在国家标准仍在酝酿时，2008 年 2 月，安徽省质监局表示该省即将出台《汽车内饰件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强制性地方标准，对汽车内的坐垫、座椅靠背、座椅套等内饰材料的甲醛、有机物等最高释放量予以限定。但在该标准的公示阶段，部分专家和汽车生产企业对标准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了异议，最后搁浅。命运相同的还有西南省份四川。当地曾计划出台《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地方标准，也因审定过程中发现一些技术问题被搁置。

### 曙光初现

不过，历时六年的车内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现在有了初步结果。2009 年 11 月，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

局联合发布《车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要求(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要求》)。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该《要求》规定了车内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醛、乙醛、丙酮等八种控制物浓度要求。不过，仅适用于至少有四个车轮，并且用于载客的，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九座的车辆。而大型客车、卡车等均不受此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公开的 PDF 版封面上带有强制性代号“GB”，可其文中称，“本标准由汽车生产、使用过程中各相关方自愿采用。”

葛蕴珊是该《要求》编制组组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该标准正处于意见收集、整理阶段。预计，主管部门最快下月将组织各方专家对其进行讨论、评审。

目前，环保部门认为标准制定

“企业难免要吃过亏以后才知道心疼，中国的银行因为环境问题吃亏的例子太多了。”郭沛源解释。在国外，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亚行对老挝南屯 2 号电站的贷款项目，由于遭到当地 NGO 的抗议，10 年来工程一直难以上马。催生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大政策的美国“超级基金法案”，也是始于上世纪纽约州著名的化工厂污染事件“爱渠”。

在中国，虽然因为环保政策会停建项目，然而，事后证明，这些项目最后均“补课通过”。这也助长了银行肆无忌惮的心理。

### 中资银行：不必盯着脚尖走路

于晓刚和中国环境 NGO 正试图敦促更多的中资商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程度，中资银行遭遇环境风险挑战的范围正扩展到了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这客观上提醒政府不仅仅为银行贴上绿色标签。

对银行而言，赤道原则由于不是国际公约，不具备强制性，更像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目前，中资银行加入赤道原则心态各异。有的想开拓跨境项目融资业务，觉得赤道原则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有的银行想把其作为品牌差异化的实践，有的则预见国家监管框架可能要发生的变化，早早开始关注赤道原则。

在李耀眼中，绿色信贷真正能够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关键，在于“形式上，需要详尽的标准体系，日常业务中，可有操作的原则，有渗透在信贷分析、评估过程中非常具体的环节设置”，而中资商业银行“离理想目标还相去甚远”。

比如，商业银行如何评估申请贷款企业的环境绩效，比如投资环保产业面临的风险近乎风投，银行决策机制中的绿色因子还不足够强大，任何的环节都可能增加额外的成本。

一位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甚至说，“如果我加入了赤道原则，而那些没有加入的银行反而更容易向赚钱的污染项目贷款，市场的公平性何以体现？”

这些均加剧了中资银行对“加入赤道原则会自戴紧箍”的担忧。郭沛源觉得，银行如果被动接受，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看作是额外的成本和束缚，如果积极主动，其前端费用可以防止项目在未来出现重大损失，比如因为移民安置不妥遭到抗议和工厂关闭。

“如果你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永远也走不快，如果你望着前方 100 米，就不会为脚下的 10 米怎么走而畏首畏尾。”郭沛源说。

# “转基因，可以慢慢来”

——专访国际农业安全专家汉斯·赫伦

◀ 上接第 9 版

改变我们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才是根本，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只会导致我们丧失物种的多样性，使得作物越来越依赖农药和化肥，并丧失应对气候变化的弹性。

南方周末：难道转基因作物与常规作物的相比，在产量上并不具备优势？

汉斯·赫伦：往往在一开始，由于除草剂或者杀虫药的使用，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可能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当害虫逐渐产生了抗药性，农民往往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产量增加就不一定了。

上个星期，孟山都承认印度的转基因棉花失败，因为害虫对抗虫蛋白产生了抗体。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发生。无论是转基因棉花或者大米，它只针对一种害虫有效，一旦这种害虫产生了抗药性，人们几乎无计可施。

转基因作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走上了一条歧路。

我在非洲曾经做过 27 年的田间研究，最终发现，在三四年内，如果使用有机物的种植方式，作物的产量可增加 10 倍，平均水平也在 2 到 3 倍的增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在发达国家一开始使用有机种植方法，产量肯定会下降。这很正常，因为农药使用量的减少。但在 5 年之后，产量就会开始增加，并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本的农业基础就很低，通过有机物的耕作方式，重新培育土地，仅仅在两三年里，产量就会增加四五倍。

实际上，这样的方式也能够解决粮食产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极大不平衡的状况，避免了发达国家的粮食作物过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破坏了后者脆弱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独立性。

南方周末：一些主张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公司认为，它们的产品将避免虫害，避免干旱，这不是事实吗？

汉斯·赫伦：虽然我们不禁禁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但我们对于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否定态度。

事实是，直到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没有满足我们任何的需求，例如虫害控制，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他更为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方式，根本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解决；又例如转基因作物的抗旱作用，我们认为，解决作物的抗旱问题首先应该从土壤吸收水分着手，而土壤的健康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的农业耕作手段解决。

转基因作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还只能恶化问题。

南方周末：欧盟不久前批准了转基因土豆的种植，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立场的转变？

汉斯·赫伦：在欧盟内部，企业和公司对于政府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一政策的出台肯定不是出自农民的意愿，而是基于这些公司对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一个腐败的农业体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为总是需要大规模的农场种植，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已经腐败的农业体系。

转基因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但至少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目前是得到了一些科学论证。所有的生物科技和种子公司都在宣传它的好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 20 年前，同样的一批公司在宣传和推广杀虫剂时的情景。那时，他们也声称杀虫剂和农药是健康的、无害的。

可是 20 年后，我们发现很多长期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逆转。我想对所有推广转基因的国家和政府说：我们不需要赶时间，赶在论证结束之前就匆忙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为此可能意味着承担更严重的长期影响。

南方周末：从 2007 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您曾经帮助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解决了重大的粮食危机，对于中国的农业转型，您有什么建议？

汉斯·赫伦：从工业生产方式到一个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在于消费者，要使其充分认识到食品在不同种植方式下带来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些食品标签的使用或者税收的激励和惩罚措施。消费者能够最终决定种植者种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种植。

当前各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模式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世界需要从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

因此，中国政府肯定需要支持生态农业的研发和创新。尤其在过渡期，农民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或者资金支持，他们应该成为直接补贴或奖励的对象，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经济学家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在转型期内，帮助农民安全过度到生态农业。我相信，不像美国，中国一旦下定了决心，运转的效率一定很高。